

收稿日期:2021-03-12

论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基本特点

王玉贵

(苏州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当代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在民间外交的实践中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相互促进”等思想。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开展的当代民间外交实践活动,除了具有领导重视、方式灵活、管道众多、对象广泛、内容丰富、与时俱进等一般特点外,还具有明确的外交目的性、非政府(官方)性、日益明显的公共外交品质等更具本质性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当代中国;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3-0019-07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委托项目“新形势下中国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王玉贵(1965—),男,江苏滨海人,苏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32

学术界对民间外交的特点已有一些探讨,基本包括方式灵活、管道众多、对象广泛、内容丰富等方面^①。当代中国的民间外交除了具有民间外交的共同特点外,还有其独有的特色之处。只有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基本特点,才能既回答学术界的一些困惑,又能更好、更深入地研究和开展当代中国的民间外交活动。

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高度重视民间外交,是新中国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届)领导人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确立了对拉工作的基本方针:“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争取建立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文化往来,逐步走向建交。”^{[1]295}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还曾说,“现在的外交不一定先由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建立”^{[2]148},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

^① 参见王炳南《寄希望于人民:民间外交工作的体会》,《世界知识》1980年第19期;刘志遥《“民间外交”之我见》,《世界知识》1987年第4期;王玉贵《论民间外交》,《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2]166}。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新中国诞生后仅两个月,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54年又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1966年改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1969年又改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业性的民间组织有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等为领导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民间外交团体之间的对外友好交往活动。

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3],又说,“如果只有两国政府间的合作,而没有民间交往,两国关系是不可能有着扎实基础的”^[4]。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政府外交工作遇到的困难局面,江泽民指出:“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时,周总理首创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为国家关系的建立开路,后来在大多数国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既有官方外交也有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不管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在看,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有一些国家建交一下子还有点困难,但民间外交可以发挥作用。”^{[5]74}又说,为了进一步对外开放,为了打破西方敌对势力的制裁,各地的外事部门要发挥自己地方外交、民间外交的优势,积极主动,多做工作^{[5]79}。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6]。这些思想的提出,大大推进了新时期我国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

进入21世纪后,胡锦涛曾明确指出,民间外交“为不断开创中国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7],并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民间外交致力于加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中国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致力于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8]。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把“广泛开展民间外交,做好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了出来,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间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民间外交的重要性。2012年5月,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十届全国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新阶段,民间外交的任务更加繁重、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党和国家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间外交事业发展。”^[9]同年7月,他在第二届中非民间论坛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在发展中非关系时,要“加强政府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有效互动,建立起中非全方位、立体化合作体系”,“创新合作理念,拓宽合作领域,增进民间交往,深化团结合作,进一步夯实中非合作的社会基础”^[10]。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民间外交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为了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他提出,民间外交要开拓创新,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对外友好交流。要以诚感人、以心暖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拉近中外人民距离。要开拓更多交流渠道、创建更多合作平台,引导国外机构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大力开展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交流。要重视公共外交,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民间外交具有主要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具体工作前后相连、未曾中断的特点。

二、具有明确的外交目的性

在民间外交的三种基本形式中,不管是官方对民间、民间对官方,还是民间对民间,任何一方都是为了一定的政治、外交目的和利益而参与其中的。民间外交虽然与政府外交有原则性区别,

但其既然同属于外交范畴,也应有其相同的质的规定性,没有明确政治或外交目的的对外交往和交流不应纳入到民间外交的范畴之中。这种目的性既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就长期目标来说,可通过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来“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11]。就短期而言,可通过民间外交来处理国家外交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政府不能或不便出面的紧急、突发、敏感事务。就此而言,“政府搭台,民间唱戏”是民间外交的典型模式。纯粹私人性质的出国探亲访友、参观旅游,留学、讲学、经商,从事学术交流等,虽然也能在客观上增进国家或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但与通常所说的民间外交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否则就会流于宽泛和漫无边际,不利于准确界定和把握民间外交的内涵与外延。至于有学者关于很难从动机和效果上来将民间外交与普通的民间往来区别开来的质疑^{[12]27},我们的看法是,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很容易将二者区别开来。比如,众所周知的中日、中美“乒乓外交”与作为普通体育活动的乒乓球比赛的区别就是非常明显的。同样,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围棋外交”与随后中日、中韩之间经常举行的围棋比赛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平时的体育比赛和交流也可能需要外交部门出面沟通和协调,甚至会因此发生外交纷争,但与将它们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或手段的外交安排相比,其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同样,某些看似平常的民间往来是否带有明确的外交动机或能否产生明显的外交效果,则既能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也可通过此类活动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来判断。

要准确了解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特有属性,也必须对其来源进行考察。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工作是从对外民间交往起步的,最多也只是一种“半独立的外交”^[13]。因为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不处于全国的执政地位,只领导各革命(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它开展外交活动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政权的包围封锁和片面宣传,向外部世界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新中国建立后,又曾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处于西方大国的包围孤立之中,只能通过“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来逐步打开外交局面。了解了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产生背景,就既很容易明白也能更深刻领会下述论断的准确含义:民间外交总要在一定的可能的范围内贯彻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要求,传递官方的外交信息^[14]。周恩来曾指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15]50}。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也说过:“中国的人民外交,是通过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来实现的。这两种形式的密切结合和灵活运用,构成了我们人民外交的体系,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最大特色。”^{[15]94}他还指出:“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16]2002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八届全国理事会会议上说:“民间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内容应随形势的发展不断发展创新。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是有机的整体,二者相互渗透,互为补充。民间外交要从群众团体的角度为官方外交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民间外交要广交朋友、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民间外交不仅要谈友好,也应包括各行各业结合不同实际需要进行交流合作。”^[17]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当代中国的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的目的性是高度一致的。这是由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三、非政府或非官方性

民间外交本来就是与政府的官方外交相对的,强调民间外交具有非政府或非官方的性质,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是同义反复,其实不然。这是由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由来和发展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民间外交是在继承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对外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一直延续至今。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掌握全国政权,它所开展的对外工作只能属于民间性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官方

外交工作空间有限,只能通过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来带动、促进官方外交的发展。但对于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这一历史背景和现实特点,不少学者似乎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有些学者一再强调,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历程有一个由“人民外交”向“民间外交”的转换过程^①。我们认为,这一说法虽然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包括民间外交在内)由意识形态色彩过浓到向正常的国家对外工作转变的鲜明特点,但同时更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中,“人民外交”是包括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的,而且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看不出由“人民外交”向“民间外交”的转换过程,因为“人民性”是贯穿于包括官方、民间和公共等所有中国外交活动的始终的。就民间外交的本质属性而言,顾名思义,是指它的非官方性质,并不是由“人民外交”转换而来的。强调民间外交的非政府性,在当代中国是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这是由当代中国至今仍没有真正实现完全统一的现实情势所决定的。这一情势决定了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对外交往行为即便在形式上具备了政府外交的特质,但就其性质而言,都只能属于民间外交范畴,否则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政府就明确宣布不承认仍未撤退的原西方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而只把其当作普通侨民看待,并且强调凡欲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都必须“另起炉灶”,通过重新谈判,明确“承认新中国,同(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割断关系”^{[18]157}才能实现。

对此,1964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会见来华商谈互设民间贸易机构的意大利参议员维托雷利时说,所谓民间,是对外而言,(对内)贸易代表实际上代表政府,贸易协定实际上也是政府性的。中国与意大利互设贸易机构就是按这一设想来处理的,对外是“民间的”,对内则是“政府性的”。因此,中方只能由民间性质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出面和意大利有关方面互设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属于民间性质的商务代表处;就意大利而言,为应对美国的巨大压力,由其对外贸易协会出面在中国设立民间性质的商务代表处,也是一种可行的现实选择。经过多次会谈,双方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尽管商务代表处在法律上是民间性质的,但却享有外交代表所具有的一切权利^[19]。

同样,中日之间在20世纪60年代在对方首都设立的廖承志办事处与高碕事务所,尽管不享受外交特权,不悬挂国旗,不使用密码电报,但在实际上,由于受到各自所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办事处和事务所享受外交机构的礼遇。廖承志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孙平化曾回忆说,办事处驻东京的“联络处几乎每天门庭若市”,宾客接踵不断,成了不叫大使馆的“小型使馆”^[20]。日本驻北京的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也被认为“实际上就是民间大使馆”^[21]。

中美之间虽有官方往来,从1955年起就开始举行大使级谈判,但始终未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即便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相互间设立的“联络处”,尽管完全具备官方职能,甚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比大使馆还大使馆”,但在性质上却仍然是属于民间层次的。中美正式建交后,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不反对美国和台湾地区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和人员交流,同意美国在台湾设立属于民间性质的“美国在台协会”。1979年1月,访问美国的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中美建交后,台湾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台湾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22]。据此,中国政府始终坚决反对美国通过的旨在将台湾当做“主权国家”来对待的《与台湾关系法》,反对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开展官方交往。中国政府也始终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参加任何

^① 参见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中国的民间外交:历史反思与学术规范》,《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人民外交”转向“民间外交”》,《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19日。另参见张胜军《民间外交的内涵与特征》,载陈雪飞主编《变革中的世界与新时代公共外交能力建设》,时事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只能由主权国参加的国际性组织,也反对台湾当局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为名而与任何国家发展官方往来。

中国与南非之间在谈判建交时,受到世人普遍尊重的“和平斗士”曼德拉曾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其在不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实现两国建交。对此,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尽管中国人民高度评价曼德拉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建立新南非过程中的杰出贡献,但绝不会接受其一再阐明的欲对大陆和台湾搞“双重承认”的主张。同时表示,中南建交后,中方不反对南非同台湾保持“民间性质”的经贸关系^[23]。正是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坚持和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终于在1998年新年的第一天正式建立了官方外交关系。

外交学及国际政治/关系学界之所以几乎都对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非政府属性未能有明确认识,只是将其作为官方外交的一种重要补充或途径来加以考察,这显然是对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历史演变脉络未予关注造成的。还有些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其所从事的外交活动“不能被看作是民间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的是政党外交,而不是“民间外交”。还认为,官方及其派出机构如外交部及驻外使馆从事民间外交的说法“有些勉强”。不过,这些学者也认为,从广义上说,一方为代表政府的个人和机构,另一方即外交工作的对象为民间的个人和组织的外交活动属于民间外交的判断,“更符合我国‘民间外交’概念严谨的事实”^[24]。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外交天地,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谱写了中国民间外交‘友好’‘和平’和‘发展’的辉煌篇章”^{[12]23}。无疑是承认,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外交工作是属于民间外交工作范畴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但它既能从事外交活动,即开展政党外交,因此从性质上说,必然就可以区分为官方或民间两个部分。

四、越来越明显的公共外交品质

尽管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公共外交的理解还存在很大分歧,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在公共外交的参与者中至少一方必须是非官方或不代表官方的,这是与民间外交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一些论者还指出,当代中国的非官方外交有一个“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的转变过程,并且认为,“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是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要求,也是国家跨文化传播能力逐渐成熟的结果”^[25]。这一说法尽管不尽符合中国民间外交的客观事实,但却揭示了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内在联系,即两种外交活动都是在与民间组织或普通民众打交道,做争取人心的工作。

近年来,公共外交越来越引人注目、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是有其原因的。近代以来,随着主权在民思想的不断确立并得到逐步公认,欧洲历史上一度盛行的秘密宫廷外交逐渐被抛弃,一些事关国家和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外交决策,往往直接诉诸公民的意愿甚至通过全民公决的形式来作出,公众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是基于对这一状况的清醒认识,中国历代(届)领导人也一直高度重视利用各种机会做国外普通民众的工作,如周恩来就多次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争取人民,了解人民,依靠人民,寄希望于人民”^[26]。在具体工作中,周恩来又多次指出,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18]52}。他强调,“我们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2]212}。即使是对顽固执行反华政策的国家,也要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积极争取广大人民。“政府之间,你反对中国,但人民的工作,我们会做,也必须去做。”^{[15]79}从新中国成立前就一直沿袭下来的做国外新闻记者工作,成了当代中国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良好传统和鲜明特色,成效也相当显著。如今,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经常要在往访国(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各种著名组织(团体)举办的活动、到著名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做演讲,甚至深入到老朋友、寻常百姓家做客,这实际上也是在做往访国(地)公众的工

作,具有明显的公共外交性质。

五、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民间外交更多的是在其本原含义上与政府外交相对应的,受“外交工作无小事”思维的影响,民间外交只是官方外交的必要补充,其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和功能就是服从并服务于政府外交的开展,有时只是因为不便开展官方外交而不得不采取民间外交的形式,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间本来应具有的界限却常常并不是很清晰。正如原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稼祥所指出的那样,民间国际活动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7]416},是围绕并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正式外交工作的,其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国人民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以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和平力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27]418},是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工作”^{[27]419}。一些研究者也指出,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外交机构只不过是一个屋里两个相通的房间,你进我出是很方便的^[28]。民间外交是特指那些不代表官方而又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29]。有的更明确指出:“民间外交是指民间往来中有官方背景和支持、自觉地、有意识地代表国家的利益,实现国家政策的民间友好活动。实际上,民间外交是‘半官半民’的外事活动。”^{[5]73}证诸当代中国某一时期的民间外交实践活动,这些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逐渐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以及“民间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大,其对外交工作的影响也日益增强。日益成熟的民间社会不仅可以为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依据和咨询意见,而且还在不断影响着外交政策制定的舆论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仅重视在国家和官方层面上开展对外交往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不断拓宽对外交往的渠道,才能使国家间关系得到更好地发展,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能因此而得到有效管控,并进而使双边、多边关系具有一种“韧性”和良好的防冲击能力。在这方面,民间外交的作用不仅不可替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会愈加突出。民间外交不应仅仅成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被动选择,而应该是一种立足长远、积极主动的理性设计^①。目前,这一认识已获得理论界和职能部门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也正以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 [1] 裴坚章.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8.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985.
- [5] 赵丕涛. 外事概说[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 [6]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9.
- [7] 张静宇. 胡锦涛会见对外友协理事会理事[N]. 人民日报,2002-05-30(4).
- [8] 王小光. 胡锦涛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并致词[N]. 人民日报,2004-05-21(1).
- [9] 杜榕. 习近平会见全国友协第十届全国理事会会议与会代表[N]. 人民日报,2012-05-16(1).
- [10] 习近平. 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发展[N]. 人民日报,2012-07-13(3).
- [11]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98-299.

^① 参见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俞可平等主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88页。

- [12] 陈雪飞. 变革中的世界与新时代公共外交能力建设[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9.
- [1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1943-1944)[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314.
- [14] 谢益显.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100.
-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第 47 辑)[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 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第 5 辑)[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201.
- [17] 吕传忠. 钱其琛在对外友协第八届全国理事会上说, 民间外交要随时代发展不断前进[N]. 人民日报, 2002-05-29(4).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19] 王若茜. 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 对 1964 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J]. 党的文献, 2012(5): 74-81.
- [20] 孙平化. 中日友好随想录[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80.
- [21] 李恩民. 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306.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474.
- [23] 钱其琛. 外交十记[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279.
- [24] 张志洲. 民间外交含义的学理分析[J]. 国际观察, 2008(5): 19-24.
- [25] 赵启正. 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4-5.
- [26] 刘庚寅. 为了友谊与和平: 民间外交亲历记[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2.
- [27] 王稼祥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 [28] 符浩, 等. 中国外交官丛书·经天纬地: 外交官在联合国[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76.
- [29] 刘志遥. “民间外交”之我见[J]. 世界知识, 1987(4): 13-15.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olk Diplomacy

WANG Yu-g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Great importance has always been attach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diplo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ideas of “letting folk diplomacy take the lead, which can facilitate official diplomacy” and “equal emphasis on official and folk diplomacy, which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thoughts, the contemporary non-governmental diplomatic practic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governmental emphasis, flexible methods, diversified channels, wide range of objects, rich content,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t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such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s distinct diplomatic purpose, non-governmental nature, increasingly distinct public diplomatic nature and so o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folk diplomacy; publ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责任编辑:朱 根〕